



厦门大学南强丛书

■【第四辑】■

XIAMEN DAXUE NANQIANG CONGSHU

汉晋之际 道家思想研究



马良怀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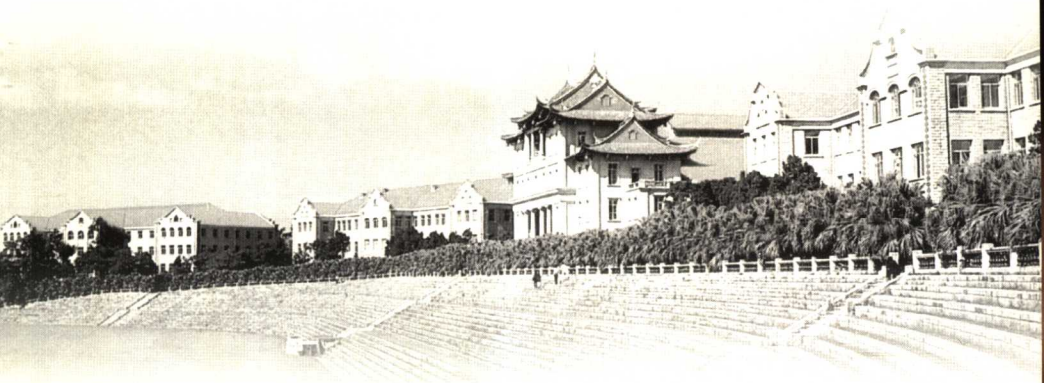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厦门大学南强丛书

【第四辑】

汉晋之际 道家思想研究

马良怀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研究/马良怀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3

(南强丛书·第4辑)

ISBN 7-5615-2537-0

I. 汉… II. 马… III. 道家-研究-中国-汉代~晋代
IV. B223.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909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大学 邮编: 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 厦门市前埔东路 555 号 邮编: 361009)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定价: 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南方之强

厦门大学在 85 年前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所创办,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传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出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先生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社会最贫穷、最落后,饱受外侮和欺凌的年代。陈嘉庚先生非常想改变这种状况,他明确提出:中国要变化,关键要提高国人素质。要提高国人素质,关键是要办好教育。基于教育救国的理念,陈嘉庚先生毅然个人倾资创办厦门大学,并明确提出要把厦大建成“南方之强”的目标。据我所知,“南方之强”是有典故的,最早是孔夫子的话,被记载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中,寓意“宽柔以教”。陈嘉庚先生用这四个字作为厦大的奋斗目标,蕴涵着他对厦门大学的殷切期望,代表着厦门大学师生的志向。因此,厦门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和校歌中咏唱的“吁嗟乎,南方之强!”标明了要使地处

中国南方的厦门大学以自己的鲜明特色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的目标。用“南强”二字作为本丛书的书眼,我想其意不言自明。

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中对大学的功能作了很好的概括。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目前,厦门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历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和关注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临厦门大学视察,对厦门大学的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在厦门大学 80 周年校庆时,江泽民同志专门给厦门大学写来贺信,希望厦门大学能够继承和发扬嘉庚精神,把厦门大学办成一所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我们要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学校的资源用在最有效提升学术水平上。出版一批高水平、能够反映学术前沿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正是这一需要使然。

在厦门大学建校 70 周年之际,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辑《南强丛书》,共 15 部学术专著,影响极佳,广受赞誉,为校庆 7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此后,《南强丛书》又出版了数辑,使得《南强丛书》成为厦大的一个学术品牌。值此建校 85 周年之际,再遴选出一批优秀之作作为《南强丛书》出版,是全校师生员工的一个愿望。入选这批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的著作多为本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前沿研究成

果。著作者中有中科院院士、文科资深教授,有全国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新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受到瞩目。这批学术著作的出版,为厦门大学 85 周年校庆增添了喜悦和光彩。

大学出版社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促进它所在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在 80 多年前,厦门大学就把“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作为自己的三大任务。厦门大学出版社作为厦门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目标与大学的发展目标是相一致的。学校一直把出版社作为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在努力提高它的水平和影响力的过程中,真正使出版社成为厦门大学的一个窗口。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的出版汇聚了著作者及厦门大学出版社所有同仁的心血与汗水,为厦门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一份特有的贡献,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由衷的感谢。我期望厦门大学《南强丛书》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反响,更希望其影响被及海外,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是我,也是全校师生的共同心愿。

厦 门 大 学 校 长 朱崇实
《南强丛书》编委会主任

2006 年 2 月 28 日

目 录

总序

导论	(1)
第一章 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复兴	(10)
第一节 顽强生存	(10)
第二节 复兴之过程	(26)
第三节 复兴之原因	(48)
第二章 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65)
第一节 传统道家学说的基本特征	(65)
第二节 正始玄学对道家思想的发展	(81)
第三节 竹林名士、郭象对道家思想的发展	(97)
第四节 张湛对道家思想的发展	(117)
第三章 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生存状态	(131)
第一节 在政治学说中的运用	(132)
第二节 在人生哲学上的体现	(144)
第三节 在道德重建中的作用	(159)
第四节 在宗教中的作用	(169)
第五节 在美学上的表现	(181)
参考书目	(191)

I. 导论 I

东汉的历史,可以和帝为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安帝以下,东汉王朝政局动荡,国事日非,逐步走向衰落。“汉晋之际”,指的就是从东汉安帝开始直至东晋、刘宋之交的这一历史时期。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史上,“汉晋之际”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党锢之祸”、黄巾起义、董卓乱京、三国争战、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加上数不清的地震、海啸、干旱、淫雨、蝗虫、瘟疫等等,可谓灾祸连绵,蜂出叠起。

但是,在道家思想的发展史上,汉晋之际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自西汉中叶以降,道家思想经过长久地潜伏、积蓄,终于在这一时期里复兴、勃发,并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东汉后期,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

随着东汉政治的日益颓坏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冲击,天人感应神学的权威逐渐动摇,一步步走向衰落,由此带来了思想领域的解放,名法之学、道家思想等纷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自东汉后期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掀起的社会批判思潮开始,名法思想来势猛烈,崛起迅速,并得到社会的普遍响应和接纳。随后,曹氏父子、诸葛亮等人将其付诸政治实践,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与名法之学的急风暴雨般地复兴风格不同,这一时期道家思想的复兴来得舒缓、平和,犹如春雨般润物无声却又无处不在。

在张衡的《髑髅赋》、《思玄赋》的字里行间,我们已能明显感到老庄思想的存在,读到了老庄式的超越情怀。儒学大师马融在“以义理解经”的同时,目光已转向道家,注释了《老子》、《淮南子》、《离骚》等道家著作。扬雄的《太玄》、王充的《论衡》等一批沉寂已久的具有浓厚道家思想的著作被蔡邕、王朗、宋衷、王肃、虞翻等人从历史的宝库中发掘出来,熟读深研,宣扬传播,一时间成为显学。

即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代,道家的人生哲学在士大夫中间仍然保持着一定影响。随着东汉后期察举征辟制度的蜕变破坏和政治的日益腐朽,使更多的士人挣脱了对功名利禄的迷恋,淡化了对社会、群体的依赖,而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中走出来接纳了道家的人生哲学。他们中有的人如韩康、矫慎、法真、戴良、庞公等等,远离尘世,遁入荒野,逍遥于山水之间;有的人如徐穉、申屠蟠、郭泰、黄宪、苻融、田盛等等,虽身在尘世,然拒绝庙堂,避祸全身,犹庄子“曳尾于途中”(《庄子·秋水》)。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宪,他出身牛医之家,既无显赫之功业,亦无藏诸名山之巨著,然而无论是在朝如陈蕃、荀淑等达官显贵,还是在野如郭泰、戴良等名流狂士,无不交口赞誉,爱慕有加,其原因就在于他身上具有一种道家的风范和气质。

道教产生于东汉后期,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始终与道家思想发生着联系。

道教产生之初,与民间信仰、神仙方术、阴阳学说等关系密切,理论上粗浅幼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即使是处于原始状态下的道教,也已经与道家学说发生了联系,出现了利用《老子》来创建道教理论的趋向,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据考证为张道陵所撰《老子想尔注》。在张角创建太平道时,“奉事黄老道”。(《后汉书·皇甫嵩传》)五斗米道的首领张修亦“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

《老子》五千文”。(《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

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

说到正始,人们自然会想到所谓的“正始之音”,想到思想界里的何晏、王弼两个重要人物,想到魏晋玄学的诞生。

我们知道,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是“以无为本”,而这“以无为本”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对《老子》学说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无论是何晏还是王弼,对于《老子》都格外地注重。据《世说新语·文学》云,何晏曾注过《老子》,只因见王弼之注远胜于己而“以所注为《道》、《德》二论”。王弼除了《老子注》外,还撰有《老子指略》。

何晏著作中有关道家思想的内容,除了张湛《列子注》中保留其《道论》和《无名论》的两条材料较完整外,其余大多散佚,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了解他的整体思想。但是,通过现存的残篇材料和典籍中有关何晏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清理出他对《老子》学说的重大发展,即何晏通过对《老子》中“无”、“道”等概念的改造,发展出“以无为本”的思想,为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寻找到了一个核心,为中国思想史上由宇宙生存论向本体论的转折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何晏相比较,少年天才王弼对道家学说的贡献更大。在《老子注》和《老子指略》中,王弼将何晏提出的“以无为本”的命题予以充实、完善,为世间一切有形之物的产生、存在确立了一个高度抽象的精神本体。同时,他还将高度抽象出来的“无”设法返回到具体的“有”之中去,使抽象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具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生命力。这种抽象与具体,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既是王弼理论思想的精华所在,也是他对道家《老子》学说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此外,王弼还将他之前的道家学说中的一对一般性的概

念——“本”与“末”——进行改造、发展,予以空前地强调和突出(于其《老子指略》中,他甚至将《老子》五千文的内容归纳成为“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由此而提出了“崇本息末”、“崇本举末”等重要命题。然后以此为指导思想,对《老子》做出了全面崭新的解释,进而对天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名教之关系,个体社会之关系等许多重大的时代课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和解答。

正始年间的名士们对《老子》思想的另一个大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政治学说方面,他们将《老》学中的“无为而治”思想纳入其理论体系,予以运用、发展,为统治阶级设计出了一套类似于西汉初年的“黄老之治”的治国方略。在这方面,仍然是王弼的贡献最大。他根据自己本末一体、体用如一的哲学思想,于其政治理论中,肯定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而将其接纳,融儒道为一体。即在王弼的貌似《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中,已经渗进了儒家的成分。这也是王弼对《老子》思想的一个大的发展。

说正始年代《老》学大盛,并不是说《庄子》的学说就没有影响,只是相对于《老》学而言,《庄》学显得不太抢眼而已。实际上,在正始玄学中,《庄子》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如王弼在调和儒道二家矛盾、建构其玄学体系中所采用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明显来源于《庄子》。

第三阶段是魏晋之际,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

曹魏齐王嘉平元年正月,司马氏父子发动高平陵之变,对士人进行大肆残杀,致使“名士减半”(《三国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个体与社会的矛盾迅速激化,儒家礼法和君权制度遭到了社会的猛烈批判和抨击。于是,反社会异化的《庄子》学说得到士人的普遍关注和实践。

在何晏、夏侯玄、李丰等大批正始名士惨遭杀戮之后,士人中又形成了另一个具有影响的团体,即所谓的“竹林七贤”。正是在

他们手中,《庄子》的学说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

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是嵇康,他在《释私论》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口号,即“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教”,就是超越、摈弃儒家的礼法名教,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嵇中散集》第二卷《与山巨源绝交书》);“任自然”,就是以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为指导,就是“以老子、庄周为师”(《嵇中散集》第二卷《与山巨源绝交书》)。

“以老子、庄周为师”,在竹林名士身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揭露儒家礼法的虚伪,抨击君权制度的罪恶,反对社会对人的异化,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塑造一种理想的人格。在嵇康的《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太师箴》,阮籍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等著作中,这一切都有充分地表露,《庄子》的思想在他们的手中得到了巨大地发挥。不仅如此,嵇康、阮籍、刘伶、阮咸等人的“以老子、庄周为师”还表现在其言行举止上,他们或拒绝庙堂而弋钓草野,或痛骂乡原而白眼冷对,或裸体独酌,或与猪同醉,或叔嫂相送,或主婢相爱,或居丧而箕踞不哭,或思友而千里命驾等等,疏远社会,抗拒礼法,张扬个体,突出自我,于精神王国中信马由缰,逍遥遨游。《庄子》的学说在这里已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和宣扬,而是走出书本,成了士人人生的指南。

此外,嵇康撰写《声无哀乐论》,突出音乐的独立性质,强调个体的主观感受,将《庄》学中的“道”寂寞无为,“乐”恬淡平和的思想发展成为音乐以和为本体的系统理论,为艺术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而独立的生存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嵇康还撰《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探讨形与神的关系,对《庄子》的养生理论予以了重大发展。

说到这一时期《庄子》学说的发展,人们自然要想到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向秀,想到他精心撰写的《庄子注》。

在嵇康、阮籍等人把目光投向理想王国,沿着《庄子》的理论去

构造超越世俗的意境,努力开拓人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向秀却俯首向下,面对着社会的现实进行严肃地思考。在其《难养生论》中,向秀公开了自己同嵇康等人的分歧,他从人的现实性出发,肯定了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和对功名利禄的欲求。在其随后撰写的《庄子注》中,向秀虽然也以王弼、嵇康等人推崇的“贵无论”为理论基础,但已有所差别,作为本体的“无”是一个“不生不化”的存在,它独立于万有的背后,并不走进“有”的世界而与之混为一体,世间的万事万物则是“生自生”,“化自化”,(详见《列子·天瑞篇注》引向秀《庄子注》)有与无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向秀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郭象、张湛等人影响甚大,为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在划清无与有的界线的同时,向秀于《庄子注》中继续发挥《难养生论》里的思想,努力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将内在的精神超越和外在的名利追求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以儒道为一”(谢灵运对向秀思想的归纳,见其著《辨宗论》)的努力使玄学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

时至西晋,郭象沿着向秀的思想再注《庄子》,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将玄学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郭象在注《庄子》的过程中,一方面抛弃了向秀《庄子注》中作为万物本体的“无”,否定在“万有”之上还有一个“生化之本”的存在;一方面又将其“生自生”、“化自化”的思想发展成“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郭象《庄子注序》)的“独化论”,以此作为建立“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理论依据。在其“独化论”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地努力,郭象终于在《庄子注》中将“迹”与“冥”,“内圣”与“外王”,“外游”与“内冥”等有机地糅合地了一起,圆满地解决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消解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

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道家思想走进宗教,为宗教的发展予以深刻地影响;同时,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

庄园经济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等方面,道家思想进一步深入其中,并更加广泛地被付诸实践。

在宗教方面,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这一时期都明显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佛教,这个“外来户”,为了能在黄土地上安营扎寨,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求与华夏文化的结合。东汉时,佛教是依附在方术上来求得生存的。至魏晋,佛教转向对老、庄的理论的汲取。如果说曹魏、西晋时佛教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是通过对玄学的依赖而获得的话,那么,到了东晋,佛教对道家思想的汲取则直接源于《老》《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僧肇,于其《肇论》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道家思想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发现他在运用道家思想来与佛教思想予以契合的智慧。正是僧肇的这一努力,为佛教开辟了由僧肇经竺道生到三论宗、禅宗这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道路。

说到东晋时期的道教,人们自然要想到葛洪,想到他精心撰写的《抱朴子·内篇》。正是因了葛洪的这部经典之作,道教才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理论,从而结束了它的原始风貌。葛洪的道教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着对道家思想的转化,而建立起来的。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将道家思想中飘渺虚空却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道”改造、转化成为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为道教体系的建构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葛洪又将道家学说中贵柔却私、见朴朴素的思想改造、转化为长生、成仙之道,为道教道德准则的建立开辟了一条健康的道路。

如果说葛洪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来转化道家思想的话,那么,与他同时期的张湛对道家思想的转化范围就更加宽阔。

张湛在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构了一个完备的二元论思想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道家思想借鉴和转化。张湛思想的核心,是将世界划分为“太虚之域”和“有形之域”两个相互依赖却又各自独立存在的两个层面,而这层面的

划分,则主要是通过对道家学说中“有”和“无”两个概念的改造和转化。张湛的历史观是循环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乱一治的循环往复,而在其社会稳定的治世,统治者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否则社会就会乱套,充分肯定了道家思想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合理存在。在其人生哲学中,张湛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予以转化、发展,建构了一种尽情现实人生而不陷入庸俗,追求精神意境而不溺于虚空的理想人生。此外,张湛还将庄子的回归自然思想与佛教的“涅槃”理论相整合,使有限与永恒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为人生确定了归于太虚之域而长存不朽的最后归宿,稀释乃至消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东晋之时,皇权衰落,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与皇帝分享政治权力的士人领袖如王导、谢安等人于是将他们钟爱的道家思想运用到治国方面,以此来消解个体与社会的矛盾,调和南北文化的冲突,营造出了一个宽松、自由的生存环境。

汉魏之际是庄园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庄园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士人的独立和自由意识,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复兴,而另一方面,复兴之后的道家思想又反过来为庄园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东晋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

东晋的士人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与大自然始终处于一种亲密和谐的状态之中,不过,此时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又在传统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这就是他们不再只是将大自然作为厚实的依赖,不再将自身与大自然不分彼此地混为一体,而是在亲近的状态下拉开了同大自然的距离,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去审视大自然,从中获取美的愉悦。于是,此时的庄园经济与东汉时期、曹魏西晋的庄园经济便有了重大地区别,如果说东汉的庄园经济特点是“宗族的居栖之地”,曹魏西晋的庄园经济特点是“人生的享乐之所”的话,那么东晋的庄园经济特点就是“幽人的息止之乡”。这一时期的庄园经济,剔除了工商的内容,淡化了聚天下珍奇之物于园中的

观念,以审美的眼光来从事庄园经济的建设,山水林木的搭配,亭台楼榭的布局,成了这一时期庄园经济建设注意的重点。庄园经济已不只是一个充分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置身其中,士人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与大自然的和谐相亲,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美的愉悦,获取一份超越世俗,宁静安详的心境。在佛、道二教蓬勃发展的时代,正是这种庄园经济与道家思想的紧密结合,引导士人将现实世界视为理想的乐土,深深地依恋人生,执著现实,进而淡化了人们的宗教情感和对彼岸世界的寻觅、追求,为中国文化沿着理性的道路延伸做出了重大贡献。

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复兴和发展的四个阶段是一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道家思想不断地获得充实、完善,并深入地在社会的诸多领域发生作用,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最为辉煌的时期。东晋以降,儒、释、道三家互竞擅长,各领风骚,思想界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到了宋代,经过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众多理学家的不断努力,成功地将儒、释、道三家学说整合成为理学,思想界重新归入一统,道家思想也就难以再现汉晋之际的历史辉煌了。

第 1 章

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复兴

西汉中叶,为了与大一统的专制政体相适应,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天人感应神学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自此以后,百家学说归于消沉,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然而,道家思想却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依然不断如缕,顽强地生存着。至汉晋之际,随着天人感应神学的衰落、颓坏,道家思想终于迈上复兴之路,成为时代的亮点。

第一节 顽强生存

道家学说,是在长江流域的明山秀水之中孕育出来的。当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独霸天下之时,道家学说依然在长江流域充分显示着不屈不挠之精神。严遵、扬雄、桓谭、王充等一批南国的优秀子民,为道家学说的生存发展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贡献。

今人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一文说“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在两汉时巴蜀颇以此见称”。西汉后期的严遵、扬雄,无疑是这方面的显著代表人物。

严遵,字君平,蜀郡成都人,生卒年月已不十分清楚,根据有关记载,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于西汉成帝年间。《汉书·王贡两龚鲍